

中国图书馆学: 20世纪的历程与反思

罗 德 运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始于20世纪初。总结和描述20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程,记录这门学科在艰难曲折中跋涉前进的历史足迹,是有意义的。本文试图通过粗略宏观的历史考察,勾勒出中国图书馆学几十年来从传统的古代图书馆学到近代图书馆学,进而到现代图书馆学的变革发展的脉络,并对之进行反思,这对于更好地借鉴过去,开拓未来,对于改革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建设,都是不无裨益的。

一、近百年来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开创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非维新改良派领袖梁启超莫属。出于那个时代的需要,也许是他个人特定的地位和实践使然,1896年,梁启超率先敲响了封建藏书楼的丧钟,开了近代图书馆的先河。他接受西方图书分类思想的影响,亲撰《西学书目表》,刊于是年9月《时务报》上,为后人废弃旧法、改用新法类分图书开拓了局面,是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先声。以此为界,从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诞生至今已逾90年。梳理一下,近百年来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大体经历了起始、成长、发展、停滞、徘徊和新时期这样6个时期。

(一) 创始期 大约起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止于1919年,经历了20年左右的时间。

兴建公共图书馆,介绍西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技术,是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显著特征。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应运而生的。近代概念的“图书馆”一词见之于报端,始于1894年。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仁人志士,向西方寻求救国良方,把西方的图书馆视为“兴国之盛举”,因而纷纷仿效西方,拟立藏书章程,颁制阅书规则,创立公共图书馆。从1904年湖南省图书馆成立,到辛亥革命前夕,其间不过数年,全国18行省中,除江西、四川、新疆外,均设立了省立图书馆,从而奠定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基础。西方图书馆事业的评述和图书馆技术的介绍,常见之于报端。辛亥革命之后,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传入我国。嗣后,各种仿杜分类法相继问世。1914年沈祖棻赴美专攻图书馆学,是中国出国学习图书馆学的第一人。中国图书馆从建制到方法的运用,多效尤美国。1918年12月,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是为图书馆协会协作之滥觞。不久终因经费困顿,不得不停止活动,表明了创始时期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步履之艰难。

这一时期,散见于各种报章杂志中的有关图书馆学各类文章共119篇。^①

(二) 成长期 这一时期起于“五四”之后,迄于40年代末,经历了整整30年的时间。

五四之后,客观地说,从2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进入了它的成长时期,并向现代图书馆学过渡。1920年初,武昌文华大学创办图书科,是为成长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的标志。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梁启超出席了成立大会,作了“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演说。自此以后,图书馆学专业刊物纷纷创刊,图书馆学研究才有了较大的拓展。涌现了一批图书馆学家。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著。仅图书馆学理论方面的专著就有杨昭愬的《图书馆学指南》(1920)和《图书馆学》(1923),戴志骞的《图书馆学术讲稿》(1923),杜定友的《图书馆通论》(1925)和《图书馆学概论》(1927),马宗荣的《现代图书馆序说》(1928),沈学植的《图书馆学ABC》(1928),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1934),程伯群的《比较图书馆学》(1935),俞爽迷的《图书馆学通论》(1936),喻友信的《实用图书馆学》(1937),陈训慈的《图书馆学函授讲义》(1937),钱亚新的《图书馆学讲义》(1945),等等。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著作多达5354篇(部)。^②

(三) 发展期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肇始,截至“文化大革命”之狂风掀起的1966年止,即俗称的“17年时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图书馆事业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图书馆学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它被列入是年制定的全国科学12年远景规划内。翌年,国务院公布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规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图书小组,并建立中心图书馆和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以负责全国和地区图书馆的协作与协调工作。所有这些,都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个时期的前半期,图书馆学教育曾有过较大的发展,除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外,北京文化学院、中国科技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和吉林师范大学都曾先后创办过图书馆学专业。至后半期,又纷纷停办,而仅只留下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个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研究有长足的进步,在基础理论、图书分类学、图书馆目录以及目录学诸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几部有代表性的图书分类法的编辑和出版,集中反映了这个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所发表各类文章的总数为4180篇。^③

(四) 停滞期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6年宣告这场“大革命”结束为止,前后历时10载,即通称的“10年内乱”期。

10年内乱是中国文化的一场大浩劫。图书馆学首当其冲,它被扔到了科学的大门之外;中国全大陆没有1个图书馆学科研机构;没有1种公开发行的图书馆学刊物;“文革”前幸免于难的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也几遭灭顶之灾,两系停止招生达6年之久,后4年虽恢复了招生,但由于学校处在“上、管、改”的状态中,教学工作一仍如前地陷于瘫痪;更没有1本正式出版的教科书;教学、科研人员曾一度被统统赶到远离学校的被文化遗忘的角落搞所谓“斗批改”,连耄耋之年的老教授也不能幸免。此情此景,令人扼腕叹息。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为空白期,也有人把它称作衰落期。说是停滞期或停顿期,恐怕更为贴切更为精当。

(五) 徘徊期 自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前后约2年多的时间。

1976年10月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宣告结束。人们习惯于把这以后称作新时期,似乎已经约定俗成。但是,若从时间上严格地划分,所谓新时期的图书馆学还经历了一个不算太短的徘徊期,这就是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为止的长达2年多的时间。这也比较符合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实际。“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人们翘首以待,

呼唤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但是,对于如何振兴处于衰落中的中国图书馆学,似乎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也没有成熟的救治方略。这就表明了新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是在怎样低落的基础上起飞的。

(六)新时期 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自此,图书馆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准确地说,真正的新时期图书馆学是从1979年开始的,因为它更具有新时期的特征。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图书馆学才真正得到了足可令人振奋的发展。这个时期不仅奠定了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深厚的基础,而且还将影响和制约着未来图书馆学发展的基本走向。新时期图书馆学的发展,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图书馆学研究。1979年7月在太原召开了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科学讨论会,大会发出了要“开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号召,奏响了图书馆学复苏的主题,标志着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兴起。旋即,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学会和各系统图书馆协会相继成立。自此以后,图书馆学的研究被纳入了组织化、协作化和有序化之中。

第二,图书馆学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本来就比较落后,经过10年浩劫,图书馆学教育几乎处于零界点的状态中,通过拨乱反正的努力,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终于走出了低谷。1979年以后,图书馆学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年底为止,设置图书馆学专业的高等学校已逾50所。现已突破过去单一的教育模式,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和多规格的专业教育体系。

第三,编辑出版、引进和翻译出版了大量图书馆学专著。既译了美国、英国、苏联、日本、印度等国的理论专著,又引进了台湾的理论教材;国内编著出版的这类教材、专著多达6种。只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同类甚至同名专著、译著相继出版,冲破了图书馆学界自解放30多年以来的沉寂局面。它们为满足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或作为海峡两岸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理论课教材、教学参考书,而各具特色。

第四,创办了大批图书馆学刊物。1979年6月《图书馆学通讯》复刊,是为新时期图书馆学理论刊物之嚆矢,至1989年5月为止,正式出版的刊物总数已逾50种。数量之多,为历史所未有。它带来了新时期理论研究的繁荣。

第五,涌现了一批图书馆学专家。他们之中,有些是“文革”前就步入学界,在经过“四人帮”文化专制的10年封冻,从浩劫中走过来的成熟学者;有些则是80年代中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专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已沉淀在其各自的论文、著作中,代表了中国图书馆学的水平。

以上只是举其大端,远未穷尽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图书馆学仍显得年轻幼稚,其学术水平还未达到应有的高度,还需要进一步的开拓。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从20世纪前几年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的发展进程,是一个由近代向现代中国图书馆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

二、对近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反思

上述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考察,只是从宏观上勾勒出了近百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尽管不很全面,且失之粗疏,但也大体上可以看出近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概貌。时过境迁,当我们回过头来对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演变的历程进行梳理的时候;面对未

来,当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结束它的第1个10年跨入第2个10年(权且采用这种机械的时间划分)的时候,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呢?

(一)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是中西文化撞击和融汇的必然产物和趋势。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光耀世界的图书馆事业,但图书馆学却鲜为人知。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从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历史的土壤中诞生,其产生的年代如此久远,发展速度是那样缓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并不是什么奇特的现象,它只能在封建社会的总背景中艰难地伸展。直到封建社会末年,情况才有所改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先驱们把开办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措施之一,并身体力行。总的来看,其影响所及,主要只是在学习西方图书馆管理思想和引进欧美图书馆技术方面,对西方图书馆历史与现状的介绍,也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因此,它只停留在图书馆工作的表面层次上,至于其深层——本自中国文化的图书馆学,即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还只处于有待发轫的萌芽阶段。维新运动失败以后,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输入,更是加速了中国封建藏书楼的寿终正寝,为萌芽状态中的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剂,它使古老的中国封建藏书楼在西方化选择中实现了向近代的历史转变,并从此开始了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新纪元。应该说,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诞生是20世纪初叶中西文化的大撞击、大融汇的喜剧结果。1917年兴起的“新图书馆运动”,在“五四”时已达高潮,恰切地说,它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图书馆运动”在二三十年代仍持久地继续发展,是“五四”精神在图书馆界的张扬。“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缚轭下脱颖而出,并作育了一代图书馆学家。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就是十分必然的了。

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应该永远记载着一位外国女性的名字:韦隶华(Mary Elizabeth Wood)(1862—1931)。这位美国年青的知识女性1900年来到中国,在武昌文华大学工作,后创办图书科,任教授,直到1931年逝世,历30余个春秋。学界泰斗、一代宗师蔡元培曾作韵语颂赞,以志钦仰。1931年9月蔡元培又亲自撰文,悼念韦隶华逝世,高度评价了她的事迹。如今距韦隶华逝世将近一个甲子了,盖棺论定,说她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是不算过分的。过去(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尤以“文革”期间为甚)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把韦隶华的来华及其活动归之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是一种不为历史负责的态度,实在是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它也无法解释中国图书馆学的演化历程。

(二)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与政治和经济改革,与文化开放和思想解放紧密相关。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中,图书馆学在中国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它却不曾在中国获到充分发展的机会。就在1956年图书馆学的研究被纳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第2年,一场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反右”运动就开始了,紧接着的是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运动一个接一个,愈演愈烈,以至发展到1966年初夏开始的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全国范围内的10年大动乱。图书馆学的状况还不发人深思么?10年浩劫使中国图书馆学遭到了最惨重的打击和摧残,它是中国自有图书馆学以来这门学科不曾获得任何发展的一个时期。然而,中国图书馆学的衰落又并不是一个孤立而偶然的現象,实际上,它只是整个学术荒芜的一个环节而已,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的衰落又更为突出,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图书馆被说成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在那个时代当然不可能逃脱被“占领”的厄运。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学的衰落可以说是毫不足异的。

新时期以来,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势必要带来国外的思想文化。80年代以后,我国相

继翻译、出版了一批美国、英国、苏联、日本、印度等国的图书馆学理论著作，中国图书馆学有了国外的参照系，并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失落点和起飞点。严格地说来，新时期图书馆学是在有了国外的参照系之后萌蘖的。中国图书馆学正是在挣脱与外界的长期封闭的阵痛中，才找到了自己的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只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国图书馆学就走了西方几十年的历程。这是继“五四”之后又一次中西文化的大撞击。和前一次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是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和文化开放、思想解放的社会背景中实现，并与10年动乱之后全民族的深刻反思相结合而进行的，因而就比上一次更深刻。20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学所经历的艰辛而又曲折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基本经验，这就是：图书馆学和科学技术一样，当社会政治环境险恶、民族文化封闭、社会思潮趋于保守，自然就不可能给它提供足以发展和繁盛的可能性；它只能在社会进步、文化开放、学术自由和思想解放的环境中，取得进步，求得发展。

（三）国外图书馆学对成长和发展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的影响。

如何评价二三十年处于成长时期中的中国图书馆学的“全盘西化”和50年代处于发展时期中的中国图书馆学的“全盘苏化”，特别是后者，是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中不应回避的一个问题。

美国图书馆管理思想和实践活动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图书馆界的巨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继沈祖棻之后，“五四”前后又有数人先后赴美，接受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国内的图书馆学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均仿照美国；引进西方技术，学习和模仿西方图书分类、编目方法；译介西方图书馆学著作，等等。这样，中国图书馆学面临着“全盘西化”的新形势。其中尤以杜威的图书馆管理思想和其《十进分类法》的影响为最大。杜威分类法能很快流传，成为中国图书馆界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分类图书的工具，并对新分类法的编制产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以振兴中国图书馆事业为己任的学者们，面对四库分类法难以统驭数量日益增多、内容日趋繁杂的古今中外图书的严峻现实，纷纷投入了编制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工作。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的短短10年间，就有20多部名称各异的分类法问世。它们无不深受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影响，有的甚或是其模仿或翻版，以致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图书分类法的鲜明的时代特点。

解放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中国失去了市场，并置于被批判的地位，为苏联图书馆学思想所取代。无可否认，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图书馆学理论有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其影响所及，直至当时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每一个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的坚信不疑及其对在这个制度下的苏联图书馆学的信赖，那些曾经赞赏过或推崇过西方图书馆学的人们，于是纷纷转向对苏联图书馆学理论的顶礼膜拜，出现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局面。这种转变，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他们是思想违心，而是表现了他们态度的忠诚，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失望，相信只有借鉴苏联的图书馆学理论，才能拯救和振兴中国图书馆事业。因此，在50年代的一个阶段中，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研究方法，或是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或是深受其影响，比之二三十年代之于欧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时期，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图书馆学著作，其中固然不乏优秀著作，但是，内容政治化、质量平平的篇章却占绝大多数。这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事实：在前所述及的5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繁荣的背后，也同时隐藏着中国图书馆学的失落。及至50年代末期中苏论争的出现，中国图书馆学的这种尴尬局面方才结束。

正确地认识二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和50年代一段时间内的“全盘苏化”对中国图书馆学

发展的影响,对未来图书馆学研究不是没有意义的。回顾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曲折历程,我们就会深深地感到我们家产的贫乏。尽管我们有令人足以自豪的悠久历史的图书馆,但图书馆学研究直到本世纪初还基本上只处于应用性的水平上。不可否认西方和苏联图书馆学理论对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无可讳言,那种全盘横移也是不利于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对外来文化的“饥不择食”,结果必然是“食而不化”,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值得细细咀嚼的教训。

(四) 图书馆学刊物是图书馆学发展的一面镜子。

通观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图书馆学刊物是反映中国图书馆学在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面貌的一面镜子。

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创始时期,还不曾有一块图书馆学的园地,有关图书馆学术的文字均散见于《时务报》、《教育杂志》、《东方杂志》、《世教新潮》等少数报刊上。在成长时期,图书馆学刊物纷纷扬扬,先后竟有70余种面世。在发展时期,公开出版的和内部交流的,计有10多种。在新时期,图书馆学刊物仅公开发行的就超过了50种。惟有停滞期,全国没有一种公开出版的图书馆学刊物。这个时期虽然也出现过几种内部交流的非正式出版物,但一般认为,受政治需要和政治激情的挤压,不要说图书馆学得不到张扬,就连图书馆的纯业务问题也未能充分地予以阐发。在这里,笔者却要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印的《图书馆工作》说几句话。70年代中期《图书馆工作》的诞生,确实为当时沉寂、萧条、衰落的图书馆学界,送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与这一时期出现的另外二三家内部刊物相比,它多少尚能给图书馆学界带来些许学术信息。它能在1975年冲破顽石,艰难而坚强地生长起来,实在难能可贵。这不能不说是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负责同志重视科学和科学工作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发展时期的图书馆学刊物为什么比成长时期的图书馆学刊物还要少得多呢?我们当然不能把刊物数量的多寡看作衡量图书馆学发展的唯一尺度,还要研究这里面的较为复杂的情况。二三十年代,图书馆学刊物数量虽然很多,但是,有的仅只出版了一个创刊号就消声匿迹,如《图书馆》、《福建图书馆协会会报》等;更多的也只是出版1卷、数卷或几期后不得不被迫宣告停刊,其艰辛之情、艰难之景,可以想见。就是发展时期的图书馆学刊物的情形,也并不喜人。在10多种刊物中,公开发行的仅只那么二、三种,而其中寿命最长的,也只不过四、五年光景。到1965年初,全国仅有的1种公开出版的纯专业刊物《图书馆》也倏然消失了,敏感的学人们就预感到了这是图书馆学危机到来的一个预兆、一种信号。1年之后预感变成现实。只有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情况才完全地改观。因此说,图书馆学刊物的兴衰,也从一个侧面透视出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兴衰。

(五) 中国图书馆事业作育了中国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学家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成长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就向我们民族奉献出了一批图书馆学家:沈祖荣、刘国钧、杜定友、皮高品、李小缘、蒋复璁……,尽管囿于狭窄的图书馆学观念;尽管当时的图书馆学研究深受欧美和日本的影响,多以图书馆工作实践的描述为主流;尽管时代没有、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尽展才智的时间和空间;他们仍然建立了为后学称颂的业绩。即使是在深受杜威分类法的影响,各种仿杜威分类法纷纷出现的年代里,比较客观地说,筚路蓝缕,中国图书馆学先驱者们的贡献仍为主要,它毕竟适应了那个时代图书馆工作的客观需要。

(下转112页)

只有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影响最大。这种区域环境异常所带来的生态链锁反应,迫使着禄丰古猿逐渐向人科转化。同样还是由于环境变化,又使人科成员向热带——亚热带地区辐射,并在多个地区向人属转化。

综上所述,依据地史资料、考古发现和生物系统进化理论,通过综合研究考察使我们确信:人科成员在上新世起源于禄丰古猿分布的中国云南和亚洲南部地区;人属成员在更新世初期起源于人科分布的中国、亚洲南部和非洲东部。

注释:①玛丽·利基:《360万年前的人类脚印》,载美国《地理杂志》1979年4月号。

②吴汝康:《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形态特征及其系统关系》,载《人类学学报》2卷(1983)第1期。

③⑤ 吴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载《人类学学报》6卷(1987)第4期。

④ 陆庆五等:《禄丰古猿雌性头像的复原》,载《人类学学报》7卷(1988)第1期。

⑥ 张兴永等:《云南元谋腊玛古猿属一新种》,载《云南社会科学》1987第3期。

⑦ 张兴永等:《云南元谋发现人属一新种》,载《云南社会科学》1987第3期。

⑧ 参见成都地院《动力地质学原理》“地壳运动的速度”,地质出版社1978年版。

⑨ 李传夔:《江苏泗洪中新世长臂猿类化石》,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卷(1978)第3期。

⑩ 吴汝康:《坦桑尼亚肯亚古人类概要》,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路易斯·利基:《奥杜韦峡谷人属一新种》,载《Nature》202卷(1964)P. 7—9。

⑪ 黄万波:《三峡高地觅踪》,载《化石》1988年1—4期。

⑫ 贾兰坡等:《西侯度》,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⑬ 汤英俊等:《河北阳原蔚县几个早更新哺乳动物化石及旧石器地点》,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卷(1981)第3期。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

(上接124页)

中国图书馆学家为图书馆学的发展所作的不懈努力,是世所瞩目的。即使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最险峻的岁月里,学人们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也没有放弃复兴中国图书馆学的努力。在1975年《图书馆工作》试刊号上发表的刘国钧先生题为《“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的文章中,跳荡着一位年逾古稀的图书馆学家急欲突破“四人帮”专制文化封锁的激情和渴望中国图书馆事业腾飞的强烈愿望。它象一束夺目的强光灿然眩目,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的夜空。这是老一代学人从心底发出的呼唤。

翌年10月,长风吹去了翳星的云。面对中国图书馆学又一次被历史无情抛在西方后头的严峻事实,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中国学者们作出了冲出徘徊的种种努力:坚决摆脱“左”的思想的羁绊,冷静地重新审视和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所提供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在面向世界中开拓了自己的思维空间。他们在各种思潮的撞击中选择自己的新见解,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中国图书馆学家以其特有的民族素质和长期积累的许多正面和反面的历史经验,在对国外图书馆学新思想的借鉴和吸取中,提出了自己独特新颖的观点。中国图书馆学家仿效西方、承袭苏联图书馆学理论的主要基点的时代,已经成为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的陈迹,他们以充满自信的声音,宣告了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崛起。

注释:

①② 据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所列各年度之“图书馆学论著”累加所得。

③ 南京图书馆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1949.10—1980.12)收录1949—1966年之论文数。

(本文责任编辑 何天齐)